

《日下新讴》与乾嘉之际的北京

陈金陵

《日下新讴》是一部反映清代中期北京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习俗的诗集，计一百六十首。稿本，高 23 公分，宽 15.5 公分，四十叶。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珍藏。除少数字因虫蚀严重，难以辨认外，全书工整楷书易读，底页有作者自述成书经过：“余性拙讷，短于口给，且病健忘，境过即水流云散，不复记忆。自乾隆己丑以后，滞迹京师，历时既久，公馀之暇，偶见闻及间间随事成讴，得讴一百六十首，累为排次，各系以注，汇记一编。置之行篋，不敢备采风之选，冀或他时归里，亲旧逢有询帝都风景者，即出示之，”款署“嘉庆三年冬十月识。”有作者黄竹堂阴之朱印。

这部诗集由于作者的文学才能的限制，艺术价值不高，但它反映着一定时期（乾隆三十四年至嘉庆三年，1769-1798）间北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，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。况且，它作为私家著述，“聊助清谈”，“庶自娱亦以娱人”，而非官修史籍，能言及官书所未能言者，又有事实性的叙注，更显得珍贵。

《日下新讴》，作者黄竹堂，江苏常熟人。清修《常昭合志》（丁祖荫纂，范树森续纂）的《艺文志》曾有著录，称“记京都风物之作，自跋”。

今天,我们能读到这部诗集,应感谢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这样珍贵的稿本,为我们研究清代北京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宝贵资料。

万方辐辏极繁华

清朝统治集团鉴于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,采取了许多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政策,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,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;在抵抗外来侵略,捍卫国家主权与平定叛乱,保卫祖国边陲方面也取得不可磨灭的业绩。这就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主要方面。

“盛世”之际的京师,有驿道可通全国各地,以至边疆哨卡,有南北大运河可达东南富裕之区,从而出现了“万方辐辏极繁华”的景象(《日下新讴》诗句,以下未注出处者,同见此)。它使京都成为全国各地物产之总汇。诗集记载了东北的鱖鱼、鹿尾,山西的石花鱼(“雪后冰封进石花”),春季谷雨前采摘的龙井茶(“雨前函锡贡春芽”)福州丁香荔枝(“福州荔枝壳园、肉厚,其甘如蜜,核小有类丁香,名丁香荔”),“西塞珍鲜哈密瓜”等等都能及时运销北京。

京师的富商大贾多集中在正阳、崇文、宣武的“前三门外货运行,茶市金珠集巨商”。一遇节日,“前门外西河沿一带,首饰绸缎金珠等铺,比户张灯夸奇斗胜,盛陈鼓吹笙歌,一路音乐不绝”尤以正月十五日元霄节为盛。各种类型的会馆也在这一带。它是繁华京师的繁华区。

“街头卖物各成歌,借器传声具亦多”,大街、小巷、胡同里有肩挑贸易,“各因其物,习成口调,高歌唤卖,或用有声之器各为区别,以代口呼,居家一听而知,最为便捷”,有“绵帛摇铃布鞞鼓,合(音革)渣击析豆汤锣”。

诗集记载了当时北京的著名中药膏散店号,有天桥的王回回

狗皮膏，西四桔井堂的礞砂膏，海淀的陈府膏，“悉出秘传，各著奇效”，使我们对北京的中药历史的了解有所增加。

“客至乾花对半斤，火锅一品备肥荤；随常款待无多费，恰够京钱三百文。”这是当时京中一般招待客人吃火锅的情形，“火锅之价不一”，便宜的“二百四十文”，“是则京钱三百文，即敷款客之资矣。”还有多种多样的小吃，如酸梅汤、酥片、麻花、灌肠等等，到处皆能买到，也有串街走胡同叫卖，“黄昏满担挑灯卖，到处闻呼灌馅肠”。三文钱一碗面茶，二文钱一个油爆果（油并？），一文钱的甜浆粥，是当时京师下层吏目、差丁充饥的廉价食物。故有“当差侵晓朔风凉，市食随宜味最长；克腹两枚油爆果，暖中一碗粥甜浆”之说。诗集记载的这些食品的价钱，为研究北京城市经济史增添了具体资料。

逛厂轮蹄塞路途

琉璃厂是当时京师的文化中心。有诗：“逛厂轮蹄塞路途，书林画数接长衢；钜公名翰悬招赏，美玉何曾韞椟沽。”琉璃厂自厂东至厂西门一带，书籍、字画、古玩等铺罗列分陈，应接不暇，车轮马蹄挤塞路途，每逢灯节，游人最盛，曰“逛厂”。乾嘉之际不少士人、学者都与琉璃厂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。孙渊如曾在此居住过。^①扬州八怪之一的名画家罗两峰在琉璃厂编写过《正信录》一书（罗两峰：《正信录》序）^②，附近前门西的廊房头条的文宝斋蜡光笺、庄心源金章水笔，能就近为士人所采用。

当时北京的著名园林，如颐和园、北海等都是宫禁之地，而陶

^①孙渊如(1753-1818)，名星衍，号季述。江苏阳湖人，乾隆五十二年殿试第二名，官山东粮道。著有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、《周易集解》等。

^②罗两峰(1733-1799)，名聘，号两峰，江苏扬州人，善山水、人物、花卉，为扬州“八怪”之一。

然亭成为游宴集会之所，在那里可南望城堞，右眺西山，“绿苇新蒲，畅襟怡目。踏青者，恒趋于此”。常有“挈榼提壶随处是，陶然亭下客陶然”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)，在京的著名学者钱载、钱大昕、翁方纲、陆耳山，程晋芳等与画家罗两峰就曾在陶然亭欢送过友人（钱大昕：《潜研堂诗集续》卷一；翁方纲：《复初斋诗集》卷十）^①

“公主坟前漾碧流，花儿闸外荡轻舟；都人雅慕江乡趣，佳日良朋戴酒游。”这是当时东便门外通惠河(运粮河)公主坟的水乡景色的写照。那里平畴旷衍，树木参差，水色明鲜，绿蒲映带，颇有江乡景趣，每逢初夏，都人多作载酒之游，谓“逛二闸”。如乾隆五十九年(1794)，在京文人吴锡麒、法式善(蒙古族)、张问陶等与画家罗两峰共游二闸，^②两峰曾挥毫作画《春泛图》法式善曾有诗云：“船行春水中，人在青天上”，“江南老画师，不甘事前让，泼墨犹未终，春波一纸漾。”这似乎把北国江南水乡景色再现在我们面前。(法式善：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五)张问陶则称：“此景无非天下无，难得宾主无迂儒，神仙玩世偶然耳。”(张问陶：《船山诗草》卷十一)它使我们看到当时士人春游时，抒发自己的思想情绪的某些侧面。

^①钱载，字坤一号彝石，浙江秀水人。乾隆十七年进士，官礼部侍郎。著有《彝石斋诗集》等。

钱大昕(1728-1804)，字晓征，号辛楣，江苏嘉定人。乾隆十九年进士，有《潜研堂全书》。

翁方纲(1733-1818)，字正三，号覃溪。乾隆十七年进士，官内阁学士，有《复初斋文集》、《复初斋诗集》。

陆耳山(1734-1792)，名锡熊，字健男，江苏上海人。

程晋芳(?-1784)，名志钥，字鱼门，江苏淮安人，有《尚书集注》等。

^②吴锡麒(1747-1819)，字圣徽，号谷人，钱塘人，乾隆四十年进士、官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。有《有正味斋集》。

法式善(1753-1813)，蒙古正黄旗人，字开文，号时帆，别号诗龕、梧门。乾隆四十五年进士，官国子监祭酒。

张问陶(1764-1814)，字仲冶，号船山。乾隆五十五年进士、官御史、知府。

“后湖百顷藕花红，银锭桥西御水通；共羨清凉什刹海，渔竿排比钓熏风。”它写下了后湖、什刹海荷花状况和每当长夏“辄纶竿比栉”的图景。那时住在这里的法式善常邀一些士人到此看荷，作诗。

京师里不少人还爱花。丰台、黄土岗一带“民户以艺花为业者不少，有“极目丰台千顷花”之称。诗集记载，卖芍药花常五苞、十苞一把，挑入城市串街叫卖，有用驴驮运玫瑰花进城者。可见当时种花者之多，买花者之众，为点缀京师做出了贡献。

“迎神百戏会中多”，为京师生活习俗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白云观长春真人丘处机生日之会，雍和宫的打鬼节，蟠桃宫的庙会等为最著。当然，其中有封建迷信成份，也有宗教信仰与习惯。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这类庙会中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体育活动，如爬竿、耍猴、弄盆、玩碗、耍罈子、打拳卖艺午弄刀枪以及秧歌舞、木偶戏等。那时的木偶戏“有从上以长丝牵引者为提偶，有以板托平移者为推偶，有置于竿首自下持之运动者为戳偶，别有剪纸象形隔素纸搬弄于后，以观其影者是为影戏。”这种形式多种的木偶戏，吸引着许多儿童。少年儿童常常“杨柳儿青，放空钟；杨柳儿死，踢毽子。”

千街夜肃定严更

“非壮丽，无以重威，”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，是汉朝萧何主持修建宫殿的主张。清朝宫殿建筑更是封建皇权主义的产物。清宫中各殿、天安门、午门，“层楼高耸五云边，”以示君权神授的观念。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坛等都是这种封建专制政治的附属物。诗集作者对此讴歌，然而作者却忠于事实，大胆写出天安门、太庙均为鸟类栖栖之所。他写道，京城内外乌鸦无巢，夜恒集于太庙，白鹭则群栖社稷坛林树之间，鸽种最繁，尤莫多于天安门城楼檐际三处，

鼎峰相望，各安其类，“昼然不动”。这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神圣宫禁之地的嘲弄。

封建皇朝对于鸟类以宫禁之地为栖栖之所。似乎并不认为是犯上作乱，而对百姓臣民的防范极严。有诗云：“千街夜肃定严更，远客初来欲吃惊；天半忽闻钟响动，满城如鼎沸梆声。”

原来京师各地段分别由八旗兵丁巡逻，各城门于日夕时，“城楼击点三通，独崇文门以钟为点，点止则闭门管钥。城内外往来车辆，一闻点下，即驰骋争先，各循旧道，谓之“赶城”，故又有“日暮城楼初下点，赶门争辙聘飞车”之句。入夜，地安门的钟楼的钟声一鸣，则各分段巡逻的万梆齐响，“顿如鼎沸”，故使“运客初来欲吃惊”。内城街市商店铺面，也只许黄昏尚可悬灯贸易，“定更下梆之后，不准开张，各铺皆熄灯闭户。”同时，九门都督则“每夜亲出巡查御道”。这种严密防范，正是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反映。

清代自乾隆中叶以后，社会经济、政治危机日益暴露，以白莲教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不断。嘉庆元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席卷鄂、湘、川、陕、甘五省，沉重打击了清廷的腐朽统治。嘉庆皇帝曾“寝食不安”，哀叹“国事不可问矣”。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朱批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六日陕甘总督奏折）嘉庆四年十月间，在严密防范的京城附近的长辛店“有盗近二十人，黑夜行劫店铺十五家”，“殴伤事主十五人”。这使嘉庆皇帝大为恼火，摘去直隶总督的顶带。随后，清廷鉴于九门提督“例系驻扎城内，城门上钥之后，外城巡捕员役或未能实力巡防，“而增设”左右两翼总兵官二人，每月轮出一人，在南城外驻扎”，“督率所属昼夜认真巡辑”。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）这正是清朝统治日益不稳的一个具体表现。

九分京仓瞻八旗

清朝的统治支柱是八旗军。八旗军除分驻长江、黄河、运河、沿海、北方长城等五大防线外，有重兵驻于京师，以资捍卫官禁重地。魏源说，“通计京师之兵，满洲、蒙古、汉军、绿营四项，共十万有奇。”（魏源：《圣武记·武事余记》卷十一）军队之多是京师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。为着维持庞大的军队与官僚机构，封建统治者在京建立着巨大的供给机关。这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，最主要的就是粮食管理部门。京城设有“禄米、南新、旧太、海运、北新、富新、兴平、太平、万安、裕丰、储济、本裕、丰益等十三仓及通州之中西二仓。每仓满汉监督各一员，专司出纳，岁需俸饷三百万石。王公文武官俸米三十余万石，例在通仓开支，其八旗兵饷二百六十余万石，统归京仓支給。”故有“岁常三百万供支，通仓一分开官俸，九分京仓瞻八旗”之说。

八旗兵丁待遇优厚，“八旗生计尽宽恢，居恒不用谋朝夕，煤米油蔬各送来。”这种不事劳作，坐吃禄米钱粮的安逸生活条件，而使八旗兵丁日益腐朽。清廷统治集团屡讲“骑射”，常举行比武，企图保持军士的战斗能力。香山之健锐营有堡楼六十八座，以资习攀蹬城楼之术，还有冰上训练等等。但这些都不能阻挡八旗军队的腐败。嘉庆皇帝曾承认，八旗将军，都统“酒肉声歌，相为娱乐”，以国家经费之需，供其“嬉戏”之用。“八旗子弟，征逐歌场，消耗囊橐，习俗日流于浮荡”。（《仁宗实录》，嘉庆四年二月癸卯，四月庚寅）。

薄暮哀呼竟乞钱

京师是皇室王公贵族，高级官僚和富商大贾的享乐天堂，贫民

百姓并不能分享京师的繁华。

清朝当局为维护其统治秩序，在京师设“普济堂”收容贫苦老弱无归之人。这只是在一定时间收容少数人，不可能收容全部穷人，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。

京师附近穷苦妇女来京，“远来非为趁闲游，一种民生口谋食，辛苦缝穷诸女伴，携篮终日返街头。”她们为人做针线活，缝制衣服，能谋生糊口也就算是幸运了。

那些“纷纷手足共胼胝，鹄立求佣闲的儿”的破产农民，求佣不可得，而“无栖宿之店”晚上权以鸡毛当被子来度寒冬的凄惨生活状况也可想见了。

“盛世”北京的一个畸形现象是偷盗扒窃猖狂和乞丐众多。诗集称扒窃者，“车马丛中善厕身，用心善与域为邻；怀金当面能攘取，贼巧真堪感鬼神。”乞丐不仅多，而且强丐不少，“乞丐刁风亦惟京师为甚，男则精赤全体栏门躺卧，女则连群结队轰入铺面”。这是当时社会财富不均的产物，他们为了谋生所采取流氓手段也是那时社会的副产品。

最可怜的是那些贫苦的残废者，“瞽者谋生剧可怜，沿街彳亍弄三弦；既弹又唱无人唤，薄暮哀呼竟乞钱”。从而勾画出繁华京师的另一凄惨的景象。

